

柳溪短篇小說集

龍山文化出版社



柳溪短篇小说集

LIUXI DUANPIAN XIAOSHUOJI

花山文图出版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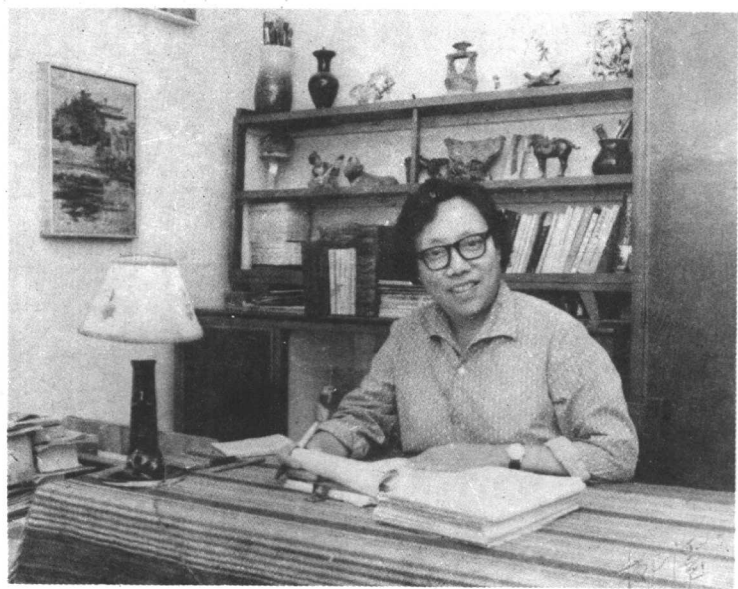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柳溪短篇小说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 1/4 印张 2 插页 169,000字 印数：1—17,100 1982年9月第1版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6286·27 定价：0.68 元



作者近影

目 录

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·····	孙 犁(1)
爬在旗杆上的人·····	(4)
我的爱人·····	(33)
鸭信陆文骏·····	(48)
我的爱情故事·····	(73)
家庭的戏剧·····	(113)
模特儿的风波·····	(135)
幽灵·····	(160)
秋菊的故事·····	(178)
骨肉·····	(203)
触角·····	(213)
初春之晨·····	(236)
新人新亲·····	(254)
后记·····	(259)

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

孙 犁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我到了河间。《冀中导报》给我登了象一张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“消息”，这则消息，使我几乎得福，旋而得祸。

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个作家（那时还很少这样称呼），就想叫我去担任“重要职务”。这在别人看来，显达的通途，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可是一问熟悉我的人，都说：“他干不了。”因此就没有做了官，一直潦倒至于今日。至于那祸，因为这则有人认为是“骇人听闻”的消息，它的副作用也相当大，第二年土地改革，就给我引来了本可避免或从轻的批判。虚名能招实祸，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。

没有担任“重要职务”，区党委还是很关心我，叫我主编了《平原杂志》，确实是“主编”，因为并没有一个同事。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梢门洞里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，是我的床铺兼坐位，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。

不久，传说新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，很洋气。又不久，传说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，要把这位女学生分配到这里来。这并非讹传，一天上午，女学生姗姗而来，坐在了我的门板上，这就是柳溪同志。

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。送走她以后，我想：从在山里时，我就是一个人编刊物，已经成了习惯。添一个人，反倒多一个人的麻烦。又是个女的，诸多不方便。我随即这样回复了上级。

我那些年，并不象现在深居简出，蛰伏一处。时常出去云游，芒鞋破钵，云踪无定，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。回来编刊物、写稿子的时间，也不过是半月。

有一年的初冬，我正在饶阳、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，忽见一个农村少妇，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，在荒野小道上，大踏步迎面而来，走在跟前，我才认出是柳溪。她已经结婚生子，并且完全农民化了。

我同她站在大道上，寒暄几句，又各奔东西。

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，带有霜雪的田野，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我不记得柳溪在老区的写作情况，进城以后，她很快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了。

在老区，也没有“女作家”这个称号，就是荷枪的女战士，也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荣誉和待遇。在大都会，则是另一回事。女作家一旦成名，便有很多身外之物包围她。柳溪好象并没有这种经历，未享捧场之乐，已遭坠渊之苦，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。

去年我才知道她是纪昀的后代。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，柳溪幼时，恐怕她的家庭，已经没落了。然而，正象荣华是没落之基一样，没落是奋起之基，柳溪幼年的学习，以及后来的写作，都是很刻苦的。我相信遗传学，她的文字，她的

为人，据我看来，都有她远祖的遗风。她为人开朗，好言笑。文思敏捷，其才足以副之；刻画深到，其学足以成之。时有嘲讽，发人深省；亦富娓娓，听者不倦。她的作品，在她给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投稿时，我已经拜读不少，常常为她那种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，击节叫好。

柳溪同志经历了漫长的艰难之途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。现在重登文坛，才力不衰，新作甚富，她的文学事业的前途，是不可限量的。我在衰老之年，忆些青春旧事，作为她的小说集的发端吧！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三时

爬在旗杆上的人

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。也有人说，这故事还在发生……

天气阴湿，到处泛潮，家家水瓮的外表上流着亮光光的水汽，人们俗称是穿了“水裤子”。如果从入夏以来第一场雨算起来，那么这倒霉的雨水已经下了整整四十天了。

这地区就是这么怪：干旱的时候，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，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；水满的时候呢，到处都积满了水，房檐的椽木全发了霉，长出了蘑菇。

现在，霏微的细雨象罗面一样，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省委会派驻这个有名的“红五月”农业社做试点工作的工作组长朱光，坐在窗前一张很高的太师椅上，抬起眼睛向外面望了一望。原野一片混沌迷茫，没有一个人影，连鸟雀都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；只有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还在雨里站着，淋得精湿。朱光叹了一口气，心里十分忧愁，又感到无事可做，非常无聊，就自言自语地叨咕起来了：“哼！雨！这该死的雨！要下到什么时候？”他想到庄稼会糟踏在地里，不觉打了个冷颤，“唉，计划怎么完成呢？我对省委怎么负责任哪？”

房门开了，进来了一个披着湿漉漉的麻袋的青年，这是

工作组的组员王玉琨。

“朱光同志，”他缩着精湿的身子，冷得颤着牙齿说，“我看咱们还是发动社员们下地收割吧！”

“什么，收割？”朱光惊讶地喊了起来，但他立刻又矜持地向窗外膘了一眼，最后又把眼睛盯在正被雨水冲刷着的玻璃窗上：“你看，外面什么样子？”

王玉琨没有挪动身子，也忘了把他那淋湿的麻袋取下来，就简单直接地解释说：发动全体社员到地里去，首先把谷子割下来，或者是只把谷穗用小镰削下来；因为谷穗已经有些变黑了，发霉了，同时还有一些粗大的谷穗已经不再下垂了；这是因为籽粒在回缩。……然后再发动社员们在炙锅上烤干。

听完了这个新颖的建议，朱光沉思起来。他的焦急的眼光停在王玉琨的黑制服上，因为那黑制服现在还顺着袖口和裤腿往下滴嗒雨水。

王玉琨忍耐不住，便急切地问：

“您说我这主意到底行不行啊？”

“哦，行不行？”朱光反剪着手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“当然是个好主意。可是，问题是，人不是比庄稼更重要吗？这样冷的天，又下着雨，要把人们淋病了怎么办？又是秋季，再得了脑膜炎可怎么好？”说着，把王玉琨身上的湿麻袋拿了下来，放在地下。

“是呀！可是光这样着急，会比到地里收割更好吗？社员们愁得吃不下饭去。有的人都要背着我们偷着到地里去了。……”

“我看，等两天怎么样？要是天晴了呢？”

“要是不晴呢？那怎么办？”

朱光又沉默了。

“刚才，”王玉琨接着说，“我已经找了老耿同志，他说这种半死不活的天气，一时半时晴不了；这是一。再说，天晴了更糟，马上也不能下地，太阳一晒，谷子就会返青，谷粒上就会发芽，到那时候，什么全完了。”

“那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也说要干就及早下手。”

“要考虑……”朱光做着深思熟虑的样子，其实他已经暗暗同意了，装出考虑的样子，只不过是显得他事事都用脑筋，都关怀，这样，做出来的决议就显得更加郑重一些。

“唔，那好吧。”他终于说了，“你立刻就去召集社务委员和生产队长到我这儿开会吧！”他又拉开门加了一句：“哎，你先把老耿叫来吧！”

王玉琨的眼光忽然活泼了，亮了，抓起地上的湿麻袋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朱光望着这青年的背影，心里暗忖道：“该死！这主意为什么不是我想起来的呢？”

正在这时，板门又忽嗒一下开了，进来了一个怒气冲冲的人。他穿着一件豆沙色的胶布雨衣，雨衣上满滚着亮晶晶的水珠；脚上穿着一双及膝的长统胶皮靴，样子很神气。他把雨衣脱下摔在椅背上。他那崭新的蓝丝光卡其布的制服上斜挎着一支照相机。他是昨天才到这里来的一位省文化供应社幻灯制片部门的摄影记者，他们在前一天已经见过，朱

光知道他的名字叫李震。

“朱光同志，您看看这象什么话！简直叫人不能忍受！”他咆哮着，挥着拳头，把帽子抓下来，扔在桌上，露出了他那卸了顶的秃头。脸上稀疏的麻点显得更清楚了。“我是来工作，不是来受气！我真奇怪，象我们这一行的人到哪儿都吃香，谁不愿意给他扩大宣传？可是这位出名的耿社长就不！哼！您想想吧，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四天里完成计划？哦，我还准备拍一张您的照片呢，您是工作组的领导人……我要拍一百二十幅，可是……头一幅就碰了钉子！”

“到底是为什么呀？”朱光站起身来，和蔼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哼！”李震摇动着他那细高条儿的身體，和朱光的矮小身体正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。“您想想，您想想我的计划呀！这是什么天，又要拍好，我在技术上遇到的困难就甭提了，好在我带来了镁光灯。……”

“那么困难是什么呢？”朱光又问。

“困难是什么？是你们的宝贝社长！大名鼎鼎的耿社长！多亏他还是个出名人物！还是个人民代表！哼！这回可让我见识见识……他一点也不重视宣传工作，我请他照相，他说没有工夫，可是他干嘛？他坐在窗前皱着眉头看雨！我怎么办？我的计划四天完成得了吗？我耐心地央求他，给他解释说这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推动全省的合作化运动，他总算答应了。照就好好照吧，可还是皱着眉头！……”

“他确实是心里烦。庄稼还在地里……”朱光很快地插了一句。

“烦？烦又有什么用？庄稼不是还长在地里的吗？既然

是这样，就该欢欢喜喜地照相喽。”他把手插在裤袋里，摇晃着身子走了几步，本来有点红的鼻子头儿现在更发红了。“我劝了他半天，总算露了露牙，拍了一张呆照。”他故意说了个术语。

“这不是挺好的吗？”朱光高兴地问。

“哼，第二张又出了事。你们不是有面大红锦旗吗？就是省人民政府奖给的那面，……”

“噢，是写着‘社会主义之花’的题词的那面吧？”

“对。我请他坐在这面旗子底下拍一张照片，这多好！多光荣！可是他刚往小凳上一坐，就象有针扎了他似的，一下就站了起来——他不照。我很恼火，可还耐着性子，又给他解释。这一回说什么也不管事，他就不肯坐在旗子下边。我就说：‘老耿同志，您为什么不坐呢？’‘我不！’他红头涨脸地说，‘这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坐在这儿？’我给他说明：‘可是你是一个领导人，是创造这个合作社的呀！’他眨了眨眼，我寻思大概是想通了，就还请他坐在那儿，我往机子上安上了镁光灯泡，刚要按钮，唉，他又从小凳上蹦起来了，板着脸说：‘不行，李震同志，这样照出来给农民弟兄看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我自己领导的合作社吗？为什么一个人要把大家的荣誉占去呢？’唉，你叫我怎么办呢！”

朱光转动了一下矮小的身体，象一切矮个人一样，他欢喜挺着胸，昂着头，好显得更高大一点。他从裤袋里抽出手来，揉搓着，很抱歉地说：“是呀！请坐吧，消消气，我们慢慢想个办法……这该死的雨！”他往窗外看了一下，雨又下大了，豆大的雨点打在玻璃上。忽然他把窗户打了开来，冒着

雨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“哎——！小张，你干什么去？”田野的道路上站着一个撑伞的青年，摆着手势，然后把手筒在嘴上喊叫着什么。“啊！去吧！”朱光说完就关闭了窗户，转过头来向李震说：“你看，这是我们站上的拖拉机手，因为无聊，到地里去看看，他们的联合收割机也没有用武之地了。唉，都要下地用手收割了，唉，拖拉机手！……”朱光说到这里，忽然觉得这样说下去没个完，便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去，“我看，我们来动员他一下吧。您放心，无论如何得让您完成任务。这象什么话！到了全省最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，结果没完成任务！这不光是您的事，也是我们的事。我们能丢人吗？不行，我们是先进社！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您也得原谅他，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声望，地位，他到底还是个农民啊！他心眼总脱不开闭塞、狭隘，看事情只看见眼前一点。比如说，因为下雨着急，……结果什么事也不想做了。昨天，我找他研究今年领导生产的经验总结，是呀，这不是正是做政治工作的好天气吗？用开会把生产队长们的时间填满，也省得他们心里惶惶不安了。可这他都摆手，哭丧着脸：‘庄稼怎么办？’你看，他就是这样。再一说，这里来人也太多，有一次这儿住了大小一共二十八个部门单位，简直是个‘小全国’，哪个人都要见见他，找他谈谈，这样一直排列很远，结果他又烦了，他也有牢骚，他常说：‘让我领导农业生产吧！我要没时间过问生产，怎么领导？我自己要不下地生产、检查，又怎么算是劳动模范？’他的话也是有道理的。不过，反过来这也是他的缺点……”他们两个都坐下，朱光递给了李震一支烟卷，顿了顿又说，“我们发现他对荣誉有些

冷淡……”

李震把眉毛一扬，很快地得出了一个推断：

“啊，是不是因为他受的奖励太多，麻痹了，或是骄傲了？”

“嗯。我们也这样考虑过，可也很难说对不对。老耿这个人，可真叫人难捉摸，你说他骄傲吧？他又谦虚；你说他服从领导吧？他又固执己见。就拿这件事说吧，你评判评判……”

他吸了口烟，把手托着下巴，手肘支在桌边上。大而圆的眼睛眯起来，象是自言自语地接着说：

“一九五二年，他随着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去了。回国后毛主席召见了，（李震在椅子上惊讶地叫起来：“哎呀！他还见过毛主席哪！”）是呀！他简直不知道是怎么样走到毛主席跟前去的。心跳得象敲鼓，脚下象踩着棉花，脑袋里象飘着云彩……毛主席跟他握手，请他坐下，还顺手在茶盘里拿了一个又香又大的苹果递给他，……毛主席问他很多问题：农民喜欢不喜欢合作社，收入比单干农民多多少？孤寡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？人们有哪些意见？……全社全年的收入除去社里一切开销社员到底能分多少粮食？比单干户又怎样？社员们对地劳分红的比例有什么意见？……甚至连鸡猪常闹什么病啦，都问到了。咱们的老耿同志也都做了回答，回答一句毛主席就微笑一下。等到后来，毛主席忽然说：‘哎，你怎么还不吃了这只苹果啊！’原来老耿手里还托着那只苹果呢！你猜我们老耿同志怎么回答的？他总是用那不慌不忙的声调说：‘毛主席！您让我把这只苹果带回去吧，我想把这苹

果切成小块给我们每个社员都尝一尝，因为，这荣誉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。’哈哈！你看看，这就是我们的老耿！……”

“哎呀！这多感动人呀！”李震眨着眼，兴奋地喊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日记本，“这应该记下来，实在感动人。”

“喝！还有呢，比如说他去苏联吧，把在电台的广播费还有节省下来的钱，买了各种东西，本子啦、自动铅笔啦、小电木碗啦，都拿来奖励了积极分子。你看见了没有，那架留声机？那是乌克兰共和国送给他的，他从没把它拿到家里去，他连装东西的两只皮箱都放在社里装了账本。他有的就是那件呢子大衣……算是他自己的纪念品。……”

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一下说不完的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朱光同志并没有夸大宣传。

李震自然又赞叹了一番，说这位社长的品质很好，但是，当他把这些都称赞完了之后，又带着探索的神气问道：

“可是，您说，他丝毫没有一点骄傲吗？”

“当然，固执己见——这里边就有骄傲的成份存在。”朱光在椅子上转过头来，眼睛迅速地向李震溜了一下，沉默地考虑起来，这是他的习惯。这个对记者、访问团、参观者从来抱着好感的人，是从不放松一个宣传的机会的。他一向把事情看成这样：“一半在做，一半在宣传。”所以他每次把这位有名的耿社长对人介绍了一番之后，便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当然，我们对他从不放松！”这一次，他觉得应该格外多说上几句，“李震同志，我说这话您信不信？什么都在于督促领导，省委派我们到这里来领导，总结经验，是有道理的。这是先进地区，什么都要在这儿首创，在这儿吸取经验！我们的责任该有多

大吧！早先我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，是特意把我调到这里来的，……从这儿也可以看出：省委多么重视这个地区……唉，……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哇！啊，快四点钟了，怎么还没有一个人来呢？”他这才想起了等着开紧急会议的事情来了。他又向李震介绍说，到地里抢救庄稼是他出的主意。

他们都望着窗外，雨下得更大了，庄稼被风雨吹打得东摇西摆，地上到处是被雨点子溅起的水泡。

全省出色的“红五月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耿开山正在办公室里。他是一个年已五十开外的蓄着一撮小黑胡髭的老头。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袄裤袄，身体细瘦，然而骨架结实。他的大眼睛的神气是深沉，宁静，安详。他那疙里疙瘩的手里正在剥着一根带着败叶的旧秫秸。

窗前，就着亮光，沉默寡言的会计乔立冬坐在一只小坐柜上，查点单据。他俩都不时地向窗外张望。倾盆大雨正在向他们对面的牲畜棚倾泻，饲养员正用铁锹锄土，阻挡冲成小沟的水流。

雨声稍停之后，会计乔立冬说：

“老耿，这笔钱能开支吗？工作组让买一点红纸绿纸贴标语，纪念十月革命节。我算计了算计，要贴的象个样子，全村三十块钱也不够……”

耿开山听着，没有言语，仍是剥他手里的那根秫秸。他向来是这样，慢吞吞的，不急于抢着发言，好象他全然没有听到这些话似的。

“要买也就该买了，还要请人写……”乔立冬又催了一